

于文斌
编著

孟子类解

國學大師
類解叢書

吉林文史出版社

孟子 类解

于文斌 编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序 言

一、孟子其人其书及其主要的思想

孟子名轲，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享年84岁。孟子幼承贤母之教，聪颖好学，及长，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道既通，以王道干谒诸侯，历游齐、梁、宋、滕诸国。时值战国，周王朝更加衰微，兼并之战愈演愈烈，世风尚权谋，以攻伐为贤。孟子言必称尧舜，力排众论而传周公孔子之学，时人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不能为世所用。孟子62岁时，结束了自己的游历生涯，回到故乡邹国，“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儒家杰出代表和集大成者，世称“亚圣”。孟子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孟子》一书中。在汉代，孟子和他的著作，等同诸子，地位并不显贵。有唐之初，依然如此。直到中唐由于韩愈的大力宣传和表彰，孟子之书初绽华采，社会地位迅速提升，被列为儒家经典。有宋之际，王安石推行变法，十分尊崇《孟子》一书中的民本、民生和制民之产的思想，并将其作为推行改革的理论依据，孟子及其著作的社会地位再次得以提升。直到宋朱熹将《孟子》和《论语》、《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以为学校的基本读本，再到宋人编刻《十三经》，《孟子》被列为其一，至此，孟子及著作的显贵地位，才得以保持和巩固。但也有一点波澜和插曲。明代朱元璋读《孟子》一书，对于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等言论，大为恼火，认为孟子不当配享孔庙，将孟子像驱出孔庙，但大臣力谏，不得已又将孟子像请回孔庙，但他对孟子所持之论，仍心存疑惧，命人删节了《孟子》，不过朱元璋死后，《孟子》一书又恢复了它的原来面目。这是一个小小的历史闹剧，集聪明与愚蠢于一身的朱元璋，终究不能阻挡人民的意志。它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孟子》一书价值所在，因为它反映那个时代人民的要求，代表了人民的意志，讲了人民想讲而未敢讲的话，这便是《孟子》的精华，是《孟子》一书被人民所推崇而历久不衰的原因所在。展开《孟子》一书，孟子对“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



革”的社会现实的愤怒与批判,对于统治者的引古论今的警示和“仁者无敌”、“保民而王”、“得乎丘民为天子”等不倦的教诲,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孟子“不失赤子之心”的人性光芒。尤其是孟子踔厉风发、势如倒海翻江的语言气势和严谨的无懈可击的论辩力量,令我们叹为观止而不能不仰而敬之。

《孟子》一书所展示出的思想创见,研究家们多有论及,前圣今贤之述备矣,笔者亦不必为之统列尽观。蔡元培先生有如下之论:“(一)承子思性说而确言性善;(二)循仁之本义而配之以义,以为实行道德之作用;(三)以养气说论究仁义之极致及效力,发前人所未发;(四)本仁义而言王道,以明经国之大法。”将《孟子》和《论语》两相对照比较,所论确矣精矣。

但从《孟子》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或者说对于后世的思想贡献方面,笔者以为有三:第一,孟子的政治论。民本思想是孟子治国思想的基础和核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德配天,明德慎刑”,这些有关民本思想的论述,已见于《尚书》。孔子对民本思想也有较为广泛而深刻的论述,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并提出“足食、足兵、民信”三条治国方针。孟子承前圣之论而阐述之,并将前圣所论推向极致。孟子将其伦理之论扩为政治论,所谓“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是也。因此,孟子将尧舜理想化,将其作为人类社会所应追求的目标。孟子很重视经济和道德的关系,主张不误农时,斧斤以时入山林,主张“民有恒产乃有恒心”,无恒心是因为无有恒产,必须从制度上和政策上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他设计八口之家应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并饲养鸡豚狗彘等等。在论及国君与人民的关系时,提出“民贵君轻”、“与民同乐”,桀纣残暴,是独夫民贼,不应称之为君,因此,孟子赞扬汤武之举。对于任用贤者、退辞不肖、刑杀有罪,都要依人民的意志为尺度,不可随意而滥觞。孔子以“德政”名其学说,孟子则以“仁政”、“王政”、“王道”等词以区别,归根结底是警告在位国君牢记历史经验,“居天下之广居”,这才是真正的“安宅”。孟子还将这一思想扩展到军事理论中,提出“天时、地利、人和”和“仁者无敌”等思想,这些都是孔子所未言,标志着孟子对于前圣的继承与发展,并对后世产生而且正在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第二,孟子所宣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人格。孔子以“君子”一词代表理想的完美人格,孟子则别以“大丈夫”而代之。大丈夫者,以浩然之气为本,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不为外部势力所屈,即使遇到困厄,且作磨炼身心之药石,而不挫其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舍鱼而取熊掌,在特殊情况下,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孟子的大丈夫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品格,曾激励成千上万的志士仁人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而前仆后继,义勇争先。它是中国的国魂。

第三,孟子的性善论和与之相联系的“仁义礼智”四德。性善论,既为周公孔

子学说之据,又填其空白而丰富之,为后世治国之所本,对管理之学、教育之学和修养方法等产生重大影响。和性善论相联系的“仁义礼智”四德,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义之端也;辞让之心,人皆有之,礼之端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智之端也。仁义礼智皆具于人的本性之中,非由外铄我也。人性既善,而人之不善,是为利欲所引,则往往放其本心而不求。因此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由此看来,孟子“仁义礼智”四德,不仅明确了人们加强个人修养的内容,也明确了修养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后继治世贤人确立了中华民族共同的道德观,为中国历代的道德建设,指明了一个基本的方向,它对中国特色文化的形成和中华民族的道德文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道德建设史上留有光辉一页。

二、孟子在中国道德建设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的道德建设史要追溯到周公。中国的道德建设源于周公对商周更替兴亡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殷商王朝是奴隶社会最黑暗的时期,野蛮残忍、蒙昧愚钝和崇尚鬼神是那个时代的突出特点。《尚书》是古代君王文告的汇编。据其所记,周公东征凯还之后,开始了周王朝的全面的政治建设。周公看到,殷人崇拜天地鬼神,并没有保佑政权的长久。殷人的败亡,是由于后来君主的骄奢淫逸,不很好地治理国家。据《史记》记,周公曾写过《大诰》、《微子之命》等若干篇,总结商周兴替的历史经验。周公认为,殷人的败亡,不是天的原因,是统治者自身的原因,是统治者残暴无德,不能仁惠于民造成的。周公认识到“天命靡常”,因此提出了“敬德保民”、“明德慎刑”、“孝养父母”等以德辅天的治国思想。周公的贡献在于:集二代文化之大成,对天命之说有所怀疑,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从而制定了“周礼”,实行“敬德慎刑”的礼治,提出了旨在长治久安的德治思想,反复告诫统治者防止骄奢堕落,怠忽政事。周公的这些思想,改变了商王朝靠天地鬼神统治人民的做法,进而转向内求,把“德”和“民”看成是同天命、天神相通的,统治者应当“以德配天”“顺天应人”。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以仁,三代之失天下以不仁。”以仁治天下,必然要实行德政,实行礼治,加强道德教育和教化,提高人民的道德觉悟,尽量减少行政和民众的以及民众之间的矛盾冲突,以维护社会的和谐有序和长治久安。对这个问题,《论语》说得很清楚:

①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②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③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④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⑤子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这五条都是讲道德和法律的问题，强调道德教化在治国中的积极作用。第一条孔子所言，讲政刑和德礼的各自作用，政刑使“民免而无耻”，而德礼可使民“有耻且格”。道德教化好似防疫站，法律政令好似医院。道德教化施之于未然，治于未萌。法律政令禁之于后，施之于已然。违法必然违背道德，违背道德不一定违法。人们倘能以高度的道德自律，就可以减少各种矛盾和事件，减少犯罪，减少行政与法律的处罚，保证政通人和、和谐有序的社会局面。第二条有子所言，是谈有孝悌之德者，不会犯上作乱。强调君子治国当务本，本就是孝悌。社会人人都有孝悌之德，社会将归和宁。第三条是讲君子学道和小人学道的问题。为官者学道则“爱民”，爱民则民心聚，有利政权的巩固。普通民众学道则“易使”，易使则协调有序，减少干群矛盾。第四条谈“听讼”的问题，可能讲于孔子任大司寇期间，孔子经常要处理大量信访狱讼案件，恐怕还有子路帮忙。此时孔子感觉压力很大，感觉民情也发生了变化。孔子提出要有治本措施，“必也使无讼乎”。孔子认为，狱讼的增多，大多是小民趋利害人，心无礼义廉耻所致，倘能使民众的道德素质提高，“防疫站”的工作到位，那后面的“医院”就不至于有较大的压力。第五条是孔子主张用“礼”，即用道德去教育干部、教育民众，这样就可以营造一个相互帮助、有仁爱温暖的祥和社會。

从周公制礼，到孔子的积极倡导，中华民族的道德文明由此薪火相传，由此而源远流长，加之历代丰富和发展，中国的道德文化更加博大精深。周公以礼治天下，其核心思想必然要会被后来杰出政治家所继承。早于孔子百余年的管仲就提出了“礼义廉耻”的“四维”之德。在《论语》一书中，孔子提出的以礼为中心的道德范畴，多达十几种，有“仁义忠恕”，有“孝悌廉耻”，有“刚毅木讷”，有“恭宽信敏惠”，还有为后人所推崇的是“智、仁、勇”的“三达”德。管仲的“四维”之德和孔子的“三达”之德，标志着中国的杰出政治家为打造中华民族共同道德观而云程始轷，它为奠定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的共同的道德品格打下了基础。在中国道德建设史上，孟子的贡献极为突出。他宗孔子为师，承道统之绪，言必称尧舜，左抨农家者流，右击杨墨之徒，闲圣人道而踔厉风发，为中华民族共同道德观的打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①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音谢）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

②孟子曰：“道在近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③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

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④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记之于《孟子》一书的这四条言论，第一条和第二条是谈道德建设的重要性。第一条是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思想的继承。第二条是有子“其为人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论点的再发挥。第三条讲的是“仁义礼智”四德，谈的是中华民族共同道德观的问题。汉代董仲舒在“四德”之后又加“信”一条，被称为“五常”。“仁义礼智”四德的提出，是孟子的创造和发明，是对孔子道德思想的重新整合和再发展。从“四德”到“五德”的发展，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道德观走向成熟和完善。第四条是既讲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又介绍了道德建设的方法，一是要通过“仁言”去教化，一是通过“仁声”去熏陶。从孟子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孟子对道德建设理论的建树，是全面而丰富的，且有创造性，他对中华民族的文明所做出的贡献，在于它统领了中国伦理道德建设两千多年，铸造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品格和人文特色。

“五常”是官方认定而推向社会的，汉唐时“孝”与“廉”两个道德范畴又为官方所重视，并确定为官员选拔的重要条件。宋承汉唐，提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孝”被列为第一位。再至清末民初，孙中山、蔡元培又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新八德，“忠”被列为第一位，体现了国家至上的时代要求。

上述这些道德范畴的提出，就其本质而言，它不是古圣先贤的杜撰和发明，它早已存在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之中，是人们社会实践的道德总结，是为人们所共同认可的行为规则。无论是周公对于周礼的创制，还是孔孟和董仲舒对于道德文化的倡导、提炼和升华，都不能脱离人类的社会实践。因此，至汉代之后，中国关于共同道德观的建设，虽有变化，但其基本精神，仍未超出孟子所论。

三、“五四”以来中国道德建设的初步分析

孔孟的伦理思想统领中国的道德建设二千多年，它铸造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品质，中国被称为文明之邦，孔孟功不可没。但是公元一千八百四十年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沉睡的中国人。列强的掠夺与瓜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一时间学贯中西的学者开始探讨古老的文明之邦何以如此羸弱而不堪一击，西方列强何以兴旺发达而虎视猎食世界。他们开始探讨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五四运动的爆发也是历史的必然。五四运动的锋芒直指儒家文化，打倒孔家的呼声一时响彻于我们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度，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将其视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思想根源，让孔孟李代桃僵，蒙受不白之冤。



孔孟生活在烽火连绵的春秋战国,那是个大变革大动荡的年代。孔孟都亲眼目睹诸侯国间征杀侵夺与生死沉浮,孟子对此有较为深刻的总结:

①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②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③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福祸无不自己求之者。这就是孟子对那时代生死沉浮的基本规律所作出的总结。用这个观点分析清朝晚期积贫积弱的原因,绝非只是列强船坚炮利,而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统治者沉迷于荣华富贵之享和勾心斗角于权力角逐,无心于国家政事的治理,纵有贤者怀金玉之见而振臂以呼,终不为纳而亡命天涯。孟子说“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财货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离娄上)政荒失理,内忧重重。有内忧则有外患。内忧外患的夹击,清之灭亡,是历史必然。孟子说:“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公孙丑上)据此论之,当年率清军金戈铁马、气宇轩昂地跨过山海关的满洲爱新觉罗家族,无论如何也未能想到曾威震九重、威加九州的大清帝国是如此孱弱和不堪一击,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祈望千年万年的龙脉竟断送于慈禧一班政治饕餮之手。伊尹曾说:“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万章上)清王朝的覆灭和历史上商王朝败亡又何其相似。“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历史再次证明了古人对于历史沉浮兴亡所下的断言。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是满清统治者自己,将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归到孔子及其儒家身上,实际上让孔子去代慈禧受过。李代桃僵,孔子蒙冤矣。

诚然,儒家思想自西汉以来,一直处于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全部,但是,封建统治者,尤其是各个朝代衰落时期,从来没有真正地实行儒家的治国思想,儒家认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主张“自强不息”,“与时偕行”,主张“允恭克让”,“忧勤惕厉”,像周公那样“思兼三王,坐以待旦”,而统治者却陶醉于“般乐怠敖”的荣华富贵中而醉生梦死,苟且时日而不思进取。儒家认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主张“推恩以保四

海”，而统治者却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儒家认为贤能君子“不素餐”，主张“贵德而尊士”，“立贤无方”，而清统治者却使贤能之士怀其宝而逃其邦。封建统治者自身虽然不践行儒家的治国学说，但他还是愿意高扬孔孟的旗帜，维护孔孟的至尊地位，这是因为他们看中了儒学对教化民众、安定社会的作用。当然更为看重的是被后儒改造了的儒学。因为这种儒学已被改造成了紧密维护封建统治的助纣为虐的腐朽文化。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应当肯定地说，孔子受周公治国思想的启发，是一个从正面而积极的角度，全面地总结尧舜至西周初年的先进文化成果。就其来源而言，一是对历史兴亡更替经验的总结，一是社会人道德实践的总结，它既有社会民众的意志要求，同时也有统治者的意志要求，是社会文明在一定阶段的成果。儒学有比较浓厚的人民性和进步性，它对于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建设道德的秩序的社会，是其同时的墨家、道家、法家所不能媲美和替代的，儒家的至尊地位，是历代杰出政治家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为了使儒学更好地为封建统治服务，封建统治者不断地对儒学加以改造。自西汉以来，历代的统治者都以各种方式对儒学进行改造，有的是删削，有的是增添，有的是不顾原意加以升华或曲解，等到公元一九一九年，儒学已非昔日的儒学，这个被改造得百孔千疮的儒学，到了它应该“涅槃”的时候了，这也是天之历数。

“五四”运动高扬反帝反封建的旗帜，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开展了对孔家店的批判。五四运动试图全面否定儒家文化，但仔细研读五四的批孔文章，其实大多集中在“三纲”、“三从”、“男尊女卑”、“存天理，灭人欲”，男人多妻制，禁止寡妇再嫁和包办婚姻，“学而优则仕”单一目的的教育思想以及“学道”不能和“学技”结合等。其实这些批判主要集中在后儒对先秦儒学的改造部分，并没有触及先秦儒学的基本伦理精神。其实五四时期那些文化人，诸如鲁迅对于母亲依然孝敬有加，堪称楷模；胡适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发老妻，依然不离不弃。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现了人类道德实践的共同认识，人类难于创造出第二套道德伦理。

五四运动试图全面西化，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实际上并未达到，而儒家文化在这次运动中，重新接受了一次洗礼，一次涅槃，一次新生，以一种原有的朴素而清新的面貌，面对那大变革、大动荡的年代，鼓励着无数先贤肩负起天下国家民族道义之重，效汤武革命之遗迹，为创造神州的舜日尧天而义勇争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自强不息等儒家文化精神，依然在孕育、培养和鼓励这个民族的优秀分子而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着。孟子说：“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但是当西子沐浴梳妆之后，会依然光彩夺目，靓丽照人。儒家文化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而重获新生，依然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五四运动的功绩是不可否认的，但五四对于儒学的批判，并没有对儒家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加以梳理，在全面否定的呼声，搞乱了中国普通民众对儒家文化



的正确认识,中国道德建设处于迷茫期和停顿期,这就是“五四”前后到建国前中国道德建设的情况。

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时期的道德建设是被政治运动、政治思想教育所替代,道德建设或有或无,道德建设处于随意期。

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建设,本是两个概念。就目的和功效而言,二者基本相同。就内容而言,两者既有区别,又有交叉和重叠。就其实施方式而言,道德建设包括学校的道德教育和社会的道德教化,它既是全面的,又是长期而循环往复的。政治思想教育则是配合国家重大政治活动而开展的,它是阶段的而不是循环的,且内容是变化的,而它的受众是有层次的,有的是全民的,有的是在一定层次、一定范围的干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道德建设,是两个教育层面,道德教育具有基础性,没有很好的道德知识做基础,政治思想教育也难于取得更大的成效。故《论语》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道德是基础,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政治素养的高低。因此,道德建设和政治思想教育各有其用,不当互相替代,也不当合而为一。

产生政治教育代替道德教育,既有历史渊源,也有当时社会背景的原因:其一,强有力政治思想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自己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中,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中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的工作方法,目的性强,快捷而易行,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敌制胜的法宝,因此,历史上成功的经验被延续是其必然。其二,新中国的建立,给饱受三座大山压迫、饱受战乱和贫穷之苦的中国人民以新的希望,人们的喜悦与热情、淳朴与善良、感恩与奋发之心,无处不呈现蓬勃向上的朝气,为政者一呼而百应,施政易而功必倍之。因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尚未突显出来。况百废待兴,万机待理,“奚暇治礼义哉”。其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尤其是关于阶级斗争思想的推行,实施对“地富反坏右”严厉打击政策,在强大政治攻势下,掩盖了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因此,出现政治思想教育代替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现象,是多方面的原因所致。

但道德教育与建设终归是要提上日程的。这一时期开展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具有重要的道德建设意义,且将其作为共产主义道德推向社会。雷锋精神是伟大而令人敬佩的,其道德含量是丰富而广泛的,就其核心而言,雷锋精神闪烁着中华美德的光辉。雷锋爱党爱国,敬业勤奋,这是“忠”。雷锋经历新旧两个社会,翻身感谢共产党,吃水不忘挖井人,以一颗赤诚的感恩之心去回报党、回报国家,这是“义”。雷锋认真学习文化,刻苦钻研技术,善能节约,这是“智”。雷锋助人为乐,团结同志,关心战友,这是“仁”。雷锋文化不高,但雷锋精神几乎涵盖了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内容。雷锋是中华民族永恒的道德典型。由于活动是从政治角度开展的,且未能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导致了人民群众把学雷锋理解成就是做好人好事,这便大大缩小了雷锋精神的道德的含量,也降低了学习的效果。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国文化浩劫的十年。从道德建设的角度,分析这次

运动,它给中国道德建设带来的损害是空前的。道德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属性,是人与人之间通过行为活动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道德的产生,或者说伦理文化的产生,来源于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它既有人类的共有属性,也有阶级的属性,既包含人类的共有意志,也含有阶级意志。如果简单地用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二分法看待传统道德,既违背道德产生的本源,又不符道德内容的实际,这样必然否定了道德的普适性,进而导致了对传统道德的全面否定。由于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念链条的延长,并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干部和教师戴上高帽子被游斗。“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于所尊者侮,无所不侮也。其余毒遗害,依然影响着一些人:一方面是不知天高地厚,蛮不讲理,个人中心,视侮官辱师以为勇,把个人意志和利益强加给组织,并以此为得计而耀于世人。一方面是心存余悸,不敢尽责。文革中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痛打落水狗”的口号,被提到了极端的高度,中庸思想被视为折中主义,恕道思想被视为阶级调和与阶级斗争熄灭论,“仁爱与恕道”美德消失殆尽,冷酷无情与斤斤计较,被一些人看做是“原则”而奉为处世信条。这种思想的存在,常常使无事变有事,小事变大,不利社会的安宁和谐。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重蹈“五四”的覆辙,全面否定儒家文化,致使一些人对中国古代文化持虚无主义态度,为主张“全盘西化”者创造了口实。对外国文化持“拿来主义”,对中国古代文化何以不持“拿来主义”呢?何以要厚彼而薄此呢?

道德作为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道德的产生与丰富发展,其中不仅有统治者的意志,也有人民的意志,但是社会存在是决定因素。因此,道德总是同一定的历史时代相联系。先进的道德意识,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前导性的促进作用。道德意识作为意识形态之一,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广泛而丰富的道德内容中,有一些是超时空的,具有永恒性。对这样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内容,我们就不能因其旧而破之,而应当将其永远地继承和发扬下去。因此,对道德不应以新旧划线而决定去就取舍。破字当头,全面否定,并力图能在“破”后而“立”一个新的,实际上是不符合道德的发生机理和道德建设的规律。经济建设有规律,道德建设没有规律,道德建设出现随意性,出现用政治运动、政治思想教育代替道德建设的情况,出现破字当头的理念,都与这种施政思想有关。意识形态的相对稳定性表明,破和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一个社会的共同道德观,或说道德范畴的提出,必然和历史道德范畴相承接,这样才能使不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旧道德被人们所扬弃,新的道德观不断得到培育和发扬。也就是十六届六中全会所讲的那样,“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文革中曾开展过学习“老三篇”的活动,如果说这算作“破”字之后的“立”,从道德范畴看三位英雄人物,张思德精神是“忠”,白求恩的精神是“义”,愚公的精神是“勇”,这种新的道德精神,仍然没有超越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范畴,是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传统道德。因此,道德建设,尤其是共同道德观



的确定,不能和历史的、传统的截然分开。同时,社会主义公民道德精神和道德伦理,是宏大的而系统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又显出不同。“忠”、“义”、“勇”三种道德观,只是这宏大系统中的一部分,不能代表全部。建设现代化的道德精神,这三种精神必不可少,但仅有这三种精神是不够的。对于中国的道德建设,费孝通先生有个总结: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到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起来。笔者认为这个评论是恰当的。破了旧的,新的尚未建立起来,自五四以来,中国人一直缺少完整系统的道德知识,底肥亏而在强烈的政治东风的吹拂中成长。当东风轻柔而习习之时,底肥缺乏症就必然要表现出来。自建国以来接受新式教育的几代读书人,除专业关涉者外,这种道德缺乏症带有普遍性。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当补上这一课。中国要建设文明的、民主的、法制的和谐社会,文盲、科盲、法盲和德盲都是对社会进步的阻碍,但以德盲为最严重。孟子说:“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尽心上)道德思想和道德知识匮乏,可能在风平浪静的生活环境下,或许会随波逐流,安分守己,平静平安地过日子,一旦遇到了生活的特殊情况,就会处事失控,如果再有“妄人”从中挑唆,就会离经叛道,为所欲为,以个人意志为中心,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人或组织,表现为不仁不智,不知道义和廉耻,甚至把小事变大,丧失理智,胡作非为,给社会的安宁和谐带来损害。对于这种情况,孟子早有预料,他强调“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尽心下)唯有归于道德,社会才能稳定和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道德建设有了新的认识,文化发展由过去的破字当头,改为积极的建设,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的观点,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和八荣八耻荣辱观的提出,指明了中国道德建设的方向,开创了中国道德建设的新纪元。因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总结中国道德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分析现实中国道德建设的现状,探索新形势下开展道德建设的新路子,为中国的文明和谐和兴旺发达做出贡献。

四、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共同道德观的大体设想

先秦儒家伦理文化,诞生于周公对于二代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成就于孔子的积极倡导,历今于两千余年,它孕育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人文品质,它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道德遗产,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道德文化是文化的重心。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则只能是在既有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文化传承、变革和创新。如果离开传统就会重蹈改革开放前的覆辙,割断血脉,迷失自我,不利中国公民的道德建设,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道德建设必有所本,这就是公民道德体系。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公民道德建设只能从这里开始。我们要建设一个有共同理想和共同道德要求的和谐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最终要体现在构建中国民族共同的道德观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打造公民道德体系的指导思想,也是共同道德观的思想核心。因此,实现时代道德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应当恰当地有效地将二者嫁接在一起,这对于延续和巩固传统道德成果和发扬光大改革开放道德建设的思想成果,都是很有好处的。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体系的广阔性,同时也决定了公民道德建设任务的广泛性和层次的多样性。因此与之相适应的中华民族的共同道德观,必须高度凝练而有概括性,以纲带目,以大带小,以简驭繁,言简意赅,好记好用。笔者认为,借用传统的道德观的表述词汇,结合时代需要而赋予其新的内涵,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道德观最为可行的办法,这也是中国特色。孔子讲“智仁勇”三达德,管子讲“礼义廉耻”四维之德,孟子讲“仁义礼智”四端之德,汉代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宋代提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孙中山、蔡元培提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新八德。笔者认为,从时代需要出发,应当以“四维五常”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道德观。宏兹九德,彰厥有常;九德咸事,则吉哉。

四维者,忠孝廉耻是也。“维”是系物的大绳,是“保障”的意思。尽己之谓忠。忠者,国之维也。将“忠”作为道德观或道德范畴,应当包含爱党、爱国和热爱社会主义,包括自觉地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忠诚于人民及其事业,爱岗敬业,尽心尽责,履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奉公守法和按章纳税等内容。孝,善事父母之谓也。孝者,家之维也。在儒家经典里,“孝悌,孝感”经常连用。孝悌慈三者,孝居首位。孝作为家庭美德的代表符号,它不仅包括尊敬和赡养父母,也包括“悌”、“慈”在内,即对兄弟姊妹的友善,对于后代和晚辈的慈爱,还包括夫妻的平等和互敬互爱等。廉,方正不贪之谓也。廉者,官之维也。一个干部能否廉洁从政,能否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既关系事业的兴衰成败,也关系到一个官员的政治前途。廉的核心之义,是不谋不当得利。廉之德不仅官员要遵守,普通百姓也存在廉与不廉的道德问题,也要奉守廉洁之德,因此,廉还应包括勤劳节俭,艰苦奋斗,不贪不当得利,用诚实劳动去争取幸福生活。耻,明善恶美丑荣辱之谓也。耻者,人之维也。耻是孔孟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它是指道德的羞耻感。孔子说做人要“行己有耻”。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耻之于大矣”。耻是做人之本,无本则不能成立,做人不明荣辱美丑,必行无道揆而为所欲为,见利不见义,见利不见法,荣辱不分,甚至荣辱颠倒,则人禽无别矣。因此,就当前而言,必须明“八荣八耻”之分,做当荣之事,去为辱之行。“忠孝廉耻”四维之德,是改造的管仲“礼义廉耻”而得之。四者,都是在治理国家中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必须高度重视。



五常者，仁义礼智信是也。“常”是永恒的，经久不变之谓常。五常者，即五种经久不变的永恒道德。“五常”源于孟子，孟子提出“仁义礼智”，汉代又加一“信”字而得之。

仁是孔子学说的思想核心。作为道德范畴，孔子的解释是：仁者，爱人。又说“仁者，人也。”孟子的解释是：“恻隐之心，仁也。”综合地看，仁，应当包含这样的道德内容：造福社会，惠爱民生，珍爱生命，关爱他人，怜悯弱小，团结互助，助人为乐，热心慈善事业等。仁在儒学中意义非常广泛。但恕道在孔子仁学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孔子曾告诉子贡终生一字之道，即为“恕”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对“恕”的解释。恕道就是要换位思考，对他人多些理解和宽容，不应得理不饶人，不要应理就敲诈他人。《易》曰：“君子以厚德载物。”有原则、有尺度的宽恕他人，也是“仁者爱人”的内容。孟子说：“仁者，天之尊爵，人之安宅也。”“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以仁爱为怀，既有益社会，也是个人求安之道。《易》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讲的是同一道理。

义，宜也，指合宜的思想和行为。思想和行为合于社会道德，合于法律政策，这就是义。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也。”孟子所言之意是，人倘能明晓善恶美丑荣辱之分，其必有羞耻感，其想必想其所当想，其行必行其所当行，这样他的思想和行为，必然是合宜的，走上了“义”的轨道。义作为道德范畴，孔子和孟子都十分重视。孔子要求做人要“义以为质”、“义以为上”、“义之与比”，在处理义利关系上，要求人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将义列入共同道德观，应当包括这些道德内容：履行公民义务；坚守正道，想所当想，为所当为，奉公守法；坚持正义，追求真理；大义所在，义勇争先，见义勇为，勇于舍生取义等。

对于礼，孟子解释为：“恭敬之心，礼也”。礼在儒家的著作里，指的是周礼，是等级社会中体现尊卑贵贱的行为规范和仪式制度等，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说法。周礼是周公综合国家和部分社会人群的意志所制定的道德礼仪规范。孔子引“仁”入礼，引“礼”于修身，提出了“不学礼，无以立”和“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主张。孔子是把周礼作为人们的社会行为道德准则来看待的，要求人们要以礼制言，以礼约行，由此看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需要有一本“公民道德礼范”。礼者，履也。范者，法也。礼范就是道德章程，道德规则。制定这样的道德行为规则，对于提高公民道德建设方有所据之本。这是就礼的广义而言。这里将“礼”作为一个道德范畴提出，是就狭义而言，主要是指“礼仪”中的“仪”，和待人接物的“恭”。就其“仪”而言，主要包括入队、入团、入党宣誓之礼，大型会议唱国歌、国际歌之礼以及纪念先烈和吊唁杰出人物之礼等。对婚丧之礼，虽然各地习俗不同，也应化繁琐为简易，其中有益于提升道德的仪程，不该省略。就其“恭”而言，主要指待人接物的文明礼貌，学生与老师，战士与首长，群众与干部，后生对于长者之间，剔除尊卑贵贱的成分，相互间谦敬有礼，仍然是建设和谐的人际关系所必须。

将“智”作为道德范畴,人们在理解上还存在差异。有人认为“智”属于技术层面,不属于道德范畴。如果站在道德角度去看“智”,就会发现它的道德内涵,它并不指 $x+y$ 、一个电厂怎么建、一座大桥怎么修。孔子对“智”有两点解释:一是“智者不惑”,它要求人要有思想,通达事理,明辨是非,这样做人做事才能通权达变,遇事不糊涂。樊迟要出去做官,问怎样做才是个聪明的官,孔子答“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聪明的官要在千头万绪中“急先务”,先致力于老百姓的合理要求;不要迷信神鬼,这会使人犯糊涂。二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乎?”在这里孔子是讲人保持“智”德必须控制情感,保持冷静和理智,否则就会因情感迷惑而不明是非,导致人犯糊涂。孟子对“智”德也有两条重要的论述:一条是“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是对为官者说的,要求为官者要明晓治事之理。一条是对百姓说的:“行而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平安无事尚可,一旦遇到考验,做人做事就失去道义之轨,就成了糊涂人。孟子给“智”德的定义是:“是非之心,智也。”这就是说,所谓智德,就是道德智慧,做人做事的智慧,即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因此,智德作为现代社会的共同道德观,它应包括这样一些道德内容:通晓事理,明辨是非;能控制情感,保持头脑冷静理智的中和状态;要重视科学,重视知识,尊敬贤者,任用人才;坚持科学发展观,尊重事物客观发展规律;要重视学习和研究业务,重视子女教育;反对迷信神鬼,反对愚昧无知。

“信”作为道德范畴已普遍为社会认同,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重要,也特别需要。

先秦典籍提出的道德范畴多至不胜枚举。这些范畴,既有大小之等,又有轻重之分,既有重叠和等同,也有交叉和包含;有的有恒久的普适价值,有的只有某个阶段的历史价值。因此,笔者以为按照抓大放小、删繁就简、有益当代的原则,以“四维五常”作为中华民族共同道德观,基本上涵盖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全部内容,既体现了文化的传承性,注入新的内涵之后,又体现了时代的需要,简洁易记,有利于道德文化的普及。

在“四维五常”共同道德观之下,还应有与之相配套的具体道德,以囊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公民道德体系。具体地说,有如下一些内容:(1)官德,官员所应遵守的道德。(2)吏德,执法执纪人员所应遵循的道德。(3)士德,知识分子所应遵循的道德。(4)兵德,军人所应遵循的道德。(5)商德,商人所应遵循的道德。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德已升为全民的道德,从生产经营领域到商贸流通,小商小贩,凡是发生交换买卖,都有遵守商德的客观要求。(6)工德,工人做工的道德。(7)耕德,农民种地的道德。(8)艺德,文艺工作者的道德。(9)医德,从事医疗医药工作者所应遵循的道德。(10)师德,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所应遵循的道德。(11)学德,即学生、学员、学徒应遵守的道德。(12)



家德,家庭中父母、夫妇、兄弟、姐妹、事业和亲属间关系的道德。(13)居德,居住之德,即和邻居友善相处,互助友爱,注意公共卫生等道德。(14)路德,包括行路、乘车、驾车等应遵守的道德。(15)友德,朋友间交往的品德。(16)仪德,外在仪表风范和语言方面的道德。(17)食德,饮食之德。这十七种道德子目,根据实际需要,亦可增加或减少。它和前面说到“四维五常”之德,合为一体,构成公民道德体系的基本框架。这些都是笔者的个人设想,皆为莅事者研究参考之用,倘有可取之处,乃为夙愿之遂,必欣欣然而快予心者焉!《诗》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新的《公民礼范》既能体现传统,又能体现时代要求,同时又能完整地以成体系的面貌出现,则业有所守之则,民有秉彝之本,彰厥有常、茅塞之心为懿德所开,乏德之症由秉彝而治,如此则于和谐文明有助力焉。

五、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需要补补课

文化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道德文化是其核心,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它的发生、发展、传承与创新,是社会人群的道德实践,知识分子在其整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的道德史表明,没有周公对于礼的创制,没有孔子的开掘与倡导,没有孟子对于圣人之道之积极捍卫,没有广大士人君子的传承和发展,中国的文明史会大大的向后推迟。因此,有人称孔子为“素王”,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孔孟奠定中国千年文明之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敬鬼神而远之的无神论观点,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和谐理念,由其初的“允恭克让”、“允执厥中”的几点文明篝火,到星火燎原,照耀古今,由其初引仁入礼、克己复礼,到仁者无敌,发施仁政等,铸成中华民族共有的人文特质,有文明礼仪之邦的美誉,知识分子在其发祥发凡传承拓充改革与创新中,于有力焉。没有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传承与发扬,或许唯余几点残火微光,作为古物而保存到博物馆里。

孔子和孟子都属于“士”阶层。由于列国间竞争与兼并战争的日趋激烈,到了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士”的队伍不仅壮大,而且社会的地位得以提升。由于“士”对于社会的作用日趋提升,加之孔孟都收徒讲学,一方面要求统治者重贤纳士,立贤无方;一方面要求学生尚志笃学,治修明之道,他们对“士”即知识分子提出很多的要求,鼓励他们入仕从政,经世致用。这些要求,对于奠定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孟子时代,知识分子队伍虽然空前壮大,这是比较而言,岂能和今天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相比?况且已不是学而优则仕一条路可走,它已广泛地深入社会各界,从政,从教,从医,从艺,搞科研,办企业,这支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方面,发挥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尤其是在优秀道德文化的传承、改革、

创新的过程中,它既是道德文明的载体,又是道德文明的传播者、实践者和示范者。知识分子不仅应当用自己专业知识服务和贡献社会,而且应当为道德文明和社会和谐发挥模范作用。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在一定意义上说,它的道德素质,决定着社会的文明进步的程度。知识分子在道德建设中具有重要的骨干作用。知识分子肩负着社会使命。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在特殊社会环境中成长的。从“五四”运动开始,到文化大革命,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直在否定和围剿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氛围中成长,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其知识是不完全的。有些人虽然大学毕业,但在道德方面大学还没毕业。这种知识的不完全性,一旦生活发生考验性的事件,就会胸无成竹而茫然,失去道德的指导而不知所措。先觉者不能觉己,岂能觉人乎?如此则“先觉”之责殆哉。我们要建设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文盲、科盲、法盲、德盲是其前进发展中的严重阻碍。“四盲”以德盲为烈。因此,建设和谐社会,知识分子肩负使命,责无旁贷,首当其冲。每一位现代知识分子都应对自己有较高的要求。

其一,知使命,树责任之心。人民养育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以知识服务国家和人民。孟子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知识分子作为“天民之先觉者”,一是要以天下为己任,“自任天下之重”。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个人的忧乐得失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找准人生定位,为人民的和乐幸福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以“不素餐”之心,奉献自己的全部光和热。文绣之士当思“泽加于民”,稷下之士要思“为生民立命”,庶人之士,则思爱岗敬业,尽职尽责。二是要做“君子儒”,勿做“小人儒”。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们的文学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先受教育,就是要“明明德”,通立身做人之道,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通立身做人之道,应当“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也”。立乎其大,就是要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立乎大者,就是知识分子要守死善道,坚定信仰,志存高远,立德为先。能立其德,则“君子儒”具矣。三是德业双馨,亦德亦专。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知识分子肩负“先觉”之责,归根结底是以自己的品德和知识去影响社会,带动人民。德不厚而业不精,有工作不愿干,不会干,混时日而不知耻,类似“寄生虫”,既背古人之训,又负人民之望,岂不悲哉!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应当是知识分子的终极追求。

其二,明义利,养淡泊之心。义利之辨,亘古常新,尤其是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之时,尤显突出。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孟子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知识分子以怎样的原则态度去对待物质利益,应当说是一种严峻的考验,